

# “女人交易”、“被拐卖的女人”与自由

——以电影《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与《盲山》为分析个案

成红舞\*

## 目录

1. 问题提出
2. “女人交易”与自由
3. “被拐卖的女人”与自由
4. 结论：自由之途

关于女性为何受压迫（或者女性为何是第二性、女性为何受歧视、女性为何不自由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实则是一个问题）这样的问题的答案，自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有精辟阐释之后，在美国女性主义浪潮中兴起的理论家如盖尔·卢宾（Gayle Rubin）也对这个问题有深刻思考。虽然对女性为何受压迫这个问题，从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有看似完整的解决，但是在现实中，这个问题却要尖锐和复杂得多，一个或者两个思想和理论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的。相对于现实，理论要苍白得多，尤其是在面对女性受压迫这一根本问题上，理论可以阐释现实，可以让问题得以澄清，但是如何解决现实问题，却往往力不从心。进一步说，当我们从女性受压迫这一根本问题中牵引出其中的一个问题——被拐卖的女人时，我们不得不在“女人交易”这一不合法却在现实中赤裸裸存在的暴力问题面前深刻地觉察到女性受压迫这一问题的现实性与迫切性，同时也不无失望地看到，关于现实中的“女人交易”这一问题在理论中却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济南大学文学院讲师，matjudy@163.com

被思考得极其有限。所幸的是，在韩中电影作品中，我们看到两部关于此类题材的电影，它们同时出现在21世纪的头十年，《盲山》(*Blind Mountain*, 由李杨编剧执导，上映于2007年，香港)与《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김복남 살인사건의 전말*, *Bedevilled*, 由张哲洙编剧执导，上映于2010年，韩国)。通过对这两部电影的比较研究，本文试图在文学作品、理论与现实以及在女性如何获得自由这三个层面上进行具体探讨；通过对波伏瓦与盖尔·卢宾关于女性自由与解放、女性交易与自由等问题的理论的阐释，试图在这两部影片中所反映出来的两个深刻问题——“女人交易”与“被拐卖的女人”——的探讨中探查西方女性主义思想在面对东方女性的现实问题上的理论困境，从而试图进一步从普遍性的层面上获得关于全球女性自由与解放的一般路径。

## 1. 问题提出

这两部电影（《金福南杀人事件始末》，以下简称《金》，2010年；《盲山》，以下简称《盲》，2007年）上映时间前后相当，都处在新世纪头十年这样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中。新世纪的开端以美国“9·11”事件为起始，标志了人类进入了一个与此前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大语境中：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过程中，世界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融合也日渐加快，但与此同时，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日益尖锐，游离于全球化文化融合轨道之外的文化的生存危机也日趋紧迫；而且在世界大同文化之外的小众文化或者个体文化仍然在向世界抛出一个又一个复杂深刻的问题。换言之，以美国“9·11”事件为标志的新世纪的开始，意味着全球化将世界上不同文化拉近的同时也暴露出了那些被世界文化所抛弃的个体文化在面对全球普遍性共识时凸显出的格格不入的性质。那些被抛弃在世界文化日渐融合的大趋势中的个体文化对普遍性共识的有意识地游离、拒绝甚至唾弃的性质，使得世界文化中的那些所谓的普遍性共识也需要我们时时对之进行普遍性的质疑。又从个体文化的游离性到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再从普遍性的

世界文化到游离性的个体文化，在目光的转移与再转移中，作为浸染全球化的世界文化普遍性共识日久的我们，不得不在面对韩国电影《金》与中国电影《盲》时首先解放我们越来越趋于同一化的语言，同时将我们的思维拉入她们的世界之中，才能够发现她们（小众或个体的文化）的问题，也同时能够发现我们（世界文化的普遍性）中的问题。在此我们有必要引入作为世界文化普遍性共识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家波伏瓦与盖尔·卢宾的理论，去关照《金》中的金福南与《盲》中的白雪梅的命运，再由她们的命运的个体性去审视波伏瓦与盖尔·卢宾的理论的局限性。从中对于女性命运，我们应当从普遍性与个体性两方面进行思考；对于女性的解放与自由，我们也应当跳出理论的窠臼，从东西方女性的普遍的前途出发作具体的与一般性的思考。

对于《金》这部影片，人们可以从中进行思考的方面很多，比如特定环境中人性问题、暴力面前人的选择问题、母性问题以及两性问题等等。然而，如果将这些问题综合起来看：一个近乎与世隔绝的小岛（影片最后呈现出来的小岛形象，是一个躺下的女人身体）、岛上女多男少与老年女人多青年女人少的畸形人口现象、每日一趟的来自岛外的小客船成为联系小岛与小岛外世界的唯一通途，以及岛上大多数人都持有恐惧小岛之外世界的独特心理。如果我们将以上因素综合起来观察——大环境中的小环境里的人性、暴力、性别、歧视、丑恶与绝望，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在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共识中，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的文化提醒着人性深处中那种曾经被普遍性共识压抑下的性别暴力、歧视与绝望。从小岛上的人性演绎中，我们也会自然反观到，作为普遍性共识的两性文明知识（平等、公正与互尊互爱）在面对特殊的两性与人性交互对峙下的冷漠与绝望时，普遍性共识的两性文明知识也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危机。由普遍性共识的两性文明知识与小岛上的两性和人性冷漠对峙的处境之间，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半个多世纪之前波伏瓦对女性自由问题的深度思索。

波伏瓦认为，当人们在思考女性问题时不应当以女性是否幸福为标准，而应当以女性是否自由为根本标准。波伏瓦提出一个对比，就是做家庭妇女的女性或许比在外面参加工作的女性幸福，但是前者绝不会比后者更自由，因为在

外参加工作或许会很苦很累，但是它会女性获得自由支配经济能力的权力和资本，因此也比只在家中做家庭主妇更自由。波伏瓦说：“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幸福’之意，更遑论其中所包含的是否是真诚之意，也无法去判断别人幸福与否。”<sup>1)</sup> 波伏瓦提出在她对女性问题进行研究的理论是存在主义伦理中的一种，即每一个主体都应当把它自己抛进具体的超越中，对现在存在的公正判决应当是看这一个主体所完成的超越是否朝向他者的自由、是否朝向未来无限的扩展<sup>2)</sup>。按照波伏瓦对自由的理解，《金》中的金福南的绝望正来自她对自由的无望：一方面她希冀于她少时同伴郑海媛，满心希望海媛能够拯救她出小岛；另一方面她小心翼翼地寻求自救，希望通过那连接小岛与外界的唯一的通途——小客船，走出那令她绝望的小岛。但是这两方面最后都落空了。自由对于金福南来说就是小岛之外的大都市——首尔。而对于那来自首尔的少时同伴郑海媛来说，小岛是她试图疗伤之地，虽然最后证明这所谓的疗伤之地实则是心伤之地。作为观者来说，最令人恐惧的与其说是小岛上的性别暴力，不如说是那同样也是来自外界的不自由的讯息。因此，无论从小岛上还是小岛之外的世界来说，自由是影片所折射出来的最令人心伤却也是最令人向往的方向。如果同样用自由的主题来关照《盲》这部电影，白雪梅面对的同样是自由的无望。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自由是这两部电影共同的主题。而自由与自由的无望也是女性在现实当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

除了自由这一主题，如果我们细究《金》和《盲》这两部电影其中的结构脉络，几项可以进行比较的微妙细节清楚可见：首先，《金》和《盲》发生的时间都在新世纪这一大的时间脉络下，新世纪起始的“9·11”事件所隐喻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文化其中的裂隙与创伤对于理解这两部电影内在的文化素质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次，《金》和《盲》这两部电影故事发生的空间都在远离都市的偏远之地，是全球性的世界文化遗落之地，也是人性的善与恶赤裸暴露之地；再次，这两部电影的女主人公都有一颗对自由的向往之心与对绝望的反

1)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p.16

2) Ibid., p.16

抗之意，正是她们的绝望与反抗绝望，让观者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恶与女性自由之路的价值；最后，在以上三个共同项中，两部电影同时向这个日渐融合的世界提出了一个古老的命题：人类的解放之路到底在何方。如果将这两部电影发生的时间和空间，以及其中所折射出来的似乎亘古不变的主题——绝望与反抗绝望，自由与自由的无望，人性的善与恶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隐喻着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普遍性（共识）与个体性（具体）、世界文化与地域文化，在这两项的对比与对立中，人们在追求普遍性的过程中是否抛弃了对个体性的关照？人们在建构世界文化的过程中，是否遗忘了对地域文化所折射出来的卑劣人性的反思？中国学者朱孝远对全球的现代化的目的提出自己的一个看法，颇为值得我们深思：“全球化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克服那种不顾整体而只注重地方利益的个体主义，而在于通过全球化的文化观念传播，让先进的事物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认可和应用。这种观点可以表述成这样一个问题：‘扫除落后的和过时的限制以及源于各种落后的意识形态和体制的障碍。’对于非西方的学者而言，这是有关自己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目标的一个基本问题：发展中国家通过力行改革和同世界标准接轨而得到提升，包括推翻落后的思想和体制，在开放的基础上获得解放。”<sup>3)</sup>学者朱孝远对全球化文化发展的观点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理解：一是全球化是未来发展中国家必须身体力行的；二是发展中国要进入全球化的文化发展轨道上，就必须“让先进的事物在世界的范围内得到认可和应用”，而且要“推翻落后的思想和体制”；三是在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之间存在一种此消彼长同时互惠互利的关系，但是应当承认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自身当中有落后的方面。朱孝远所指的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应当包括中国在内，因此中国文化要走向全球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消除自身文化当中落后的思想和体制，这是走向全球化必然进行的自我反思、自我修正和自我发展过程。扩而言之，任何一个国家要进入全球化，即融入世界文化当中，都必须对自身文化进行反思、修正和重构。全球化下的普遍性共识知识不是特指某

3) 朱孝远：《全球文化研究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

一个国家的文化知识，也不是指某些发达国家的文化知识之和，而是全球化下来自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互相膨胀、相互修正与不断重构的过程中最后被公认的有利于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未来发展的共识知识。但是对于全球化与个体文化之间的关系，还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全球化是对个体文化的压抑，比如学者张旭东认为：“文化或文化政治意义上的‘个性’，实在是一种要求很高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一个民族、一种文化或文明传统的根本气质，是它以自己不可替代的特殊方式展现出来的某种无可抗拒的普遍价值和精神魅力。”<sup>4)</sup>

归纳而言，全球化是世界文化中的普遍性共识知识对个体文化中的落后的文化观念进行涤荡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体文化在抗拒来自普遍性共识知识修正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东西，这是人们在全球化进行中对世界文化与个体文化之间所产生的普遍的共识之一。全球化与个体文化之间的逐力是相互的，不是说普遍性共识知识全都不对，也不是说个体文化全对，而是应当看到，如果我们不能积极地去反思个体文化中落后的质素，那么世界文化中所谓的普遍共识的知识也将面临着挑战。但同时所谓的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共识的知识同样需要人们不停地进行反思与再反思，因为如果将所谓的世界文化的普遍性共识的知识看作是铁板一块、一有永有的、无需反思的，那么人类文化的未来必将堕入危机之中。这两种逐力的方面在对待性别问题上尤其令人瞩目，性别平等与性别公正世界文化中的普遍性共识，但是在某些个体文化中对性别平等与性别公正的认同度仍然不够，或者在实践中存在很多有待修正的地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从韩中两部电影《金》与《盲》中的女性被压迫的现实个体处境出发去审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时，我们才能够更清楚地看到，全球化所形成的两性共识知识正面临着个体文化中的质素的深刻影响。

4)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 2. “女人交易”与自由

波伏瓦用自由与否的标准来判断女性解放与否的现实，这一观点是波伏瓦首创，因此也对后来的女性主义在女权与权益方面进行不懈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和精神基础。波伏瓦认为，如果女性不能作为一个主体将自己抛进面向未来的进程中，而且把女性自己抛向未来的意志也被剥夺，那么这就是一种“根本的恶”<sup>5)</sup>。电影《金》与《盲》所反映出来的对女性自由的限制与禁绝表明其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恶。波伏瓦曾经拒绝在为纳粹申辩的请愿书上签字，因为她认为审判纳粹是对受害者的正义。在《以眼还眼》一文中波伏瓦首次提出她对根本之恶的认识，她说根本之恶就是“有人蓄谋把他人贬低到物的位置上”<sup>6)</sup>。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当一个实体的物处在资本的关系中，那么物就会变成商品，而商品则维系着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物不只是我们制造的产品，设计来帮助我们满足基本的本能需求，物也是我们藉以表现我们是谁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的表达方式，而这也是形塑社会进展的要素。”<sup>7)</sup> 这里的关键不是物本身，而是形塑物的力量是什么？而波伏瓦正把这种对人的形塑，并且是以暴力的方式进行物的形塑看作是根本的恶。

在电影《金》与《盲》中，金福南与白雪梅被一种根本的恶贬低到物（没有自由并且被禁绝追求自由的意志）的存在。所不同的是，金福南被不断地在男人之间进行交易，而白雪梅在交易一次（被人贩子卖给了中国关中偏远农村的一个粗鄙的男人手中）之后完全成为了一个物之工具（生育的工具）。在那个远离大陆的偏远小岛上，金福南成了岛上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为了留住两个青壮年（在影片中，其中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被金福南称为姑姑，而那两个青壮年被那个姑姑称为侄子）在岛上干一些所谓没有男人就干不成的活，比如修

5)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p.16

6) Margaret A. Simons ed. *Simone de Beauvoir: Philosophical Writing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4, P.253

7) 刘深林：《物与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3页。

葺房顶与干农活。在影片中，在修葺房顶的过程中，金福南干得是搅拌水泥的活，而搅拌水泥的活才是最辛苦的；而那群上了年纪的女人只站在一边说话，她们一方面说着夸赞两个青壮年的那些陈词滥调的话，什么没了男人就不行之类的；一方面那个姑姑说着贬低金福南的话，意思大概就是女人的活怎么会累。影片中对金福南伤害最大的是那个姑姑，在她那里，有着一整套男尊女卑的陈旧观念。而其他那些上了年纪的女人是附和者，她们构成了姑姑观念的拥戴者。正是那群上了年纪的女人的话语建构了小岛上绝对的男权文化。两个青壮年、一群男权文化崇拜者与建构者的老年女人、一个自始至终沉默的老年男人，以及金福南和她的十岁女儿，还有来自岛外的郑海媛和来往岛内外的、同样属于小岛人的客船人，五组存在构成了小岛文化的不同质素。就影片所展现出来的空间，有这么几重关系是非常明确的：一重是男权文化的崇拜者与建构者的老年女人，她们的存在与她们的男权话语是两个青壮年的男权行为最好的诠释，也是最有力的维护者，同时也是男权暴力的美化者，她们本身就是男权暴力的帮凶；两个青壮年本身代表了男权文化的最大特点：冷酷、暴力、阴险与虚伪；在金福南的十岁女儿被撞石死去后，在前来调查的警察面前，五组存在完全显露了各自的特点：伪善的男人与一群颠倒黑白的老女人，冷酷无情的外来人（郑海媛和客船人）还有一个永远都沉默不语的看客（一个自始至终沉默的老年男人）。最后前来调查的警察成了伪善的男人与颠倒黑白的老女人在乡情包裹着人情的投降者，他在似是而非的怀疑中、在乡情与人情的包裹中，离开了小岛。然而，最终被出卖的，是金福南和她被暴力夺去生命的女儿。在这几重关系的背后，还有几条可以辨析的人性轨迹，即或许可以阻止暴力继续发生的力量：一条力量可能来自警察，然而正是由于他对小岛上乡情与人情的同情，让他在怀疑面前止步；一条力量可能来自郑海媛，然而正是她的冷漠，最终让金福南彻底绝望。如果说，金福南是老年女人在两个青壮年面前进行交易的物（老年女人通过限制金福南于小岛之上，从而使得两个青壮年留在岛上；而反过来，其中一个青壮年正是利用了这种心态，强暴了金福南的女儿，事后证明这种暴力行为也得到了老年女人的认可），那么郑海媛就是默认这种



物的交易存在的外在力量，而警察则代表虽明察却仍然沉默或者将信将疑的政府力量。如果在拯救与被拯救的意义上将外在力量和政府力量看作是一种世界文化与国家机器力量的话，那么金福南的悲剧就不仅仅是一个小岛与岛外之间的呼救与沉默的关系，而是世界文化与国家机器对个体文化落后力量的无视与包容的可悲与可怕的事实。

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盖尔·卢宾在《女人交易——性的“政治经济学”初探》一文中经过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的物的资本关系的考察发现，“劳动力的再生产与产品之间的差值取决于人们对生产劳动力的计算。马克思认为这种对生产劳动力的计算基本上取决于商品数量——食物、衣服、住房和出行——这些是保持一个劳动力健康、生命和劳动能力的必需品。”<sup>8)</sup>在电影《金》中，各种关系构成了一个劳动力生产的基本单位，人们依赖那种男权关系的稳定性，以维持小岛上基本的生存和生产关系的永恒性。盖尔·卢宾通过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中对性别压迫的思考，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性别压迫的事实。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指出为什么这种赤裸裸的性别压迫却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的劳动力关系之一。因此，盖尔·卢宾引进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结构主义的分析视角，指出将女人作为人际关系联系纽带而进行关系的交换这种原始的物物交换模式仍然作用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是原先的物物交换变成了人人交换后来变成了人物交换。盖尔·卢宾指出，“关于性别的区分最后变成了一个禁忌，一个拒绝男性与女性本来一样的禁忌”<sup>9)</sup>女性变成了维持男性之间关系的交换品或商品，通过交易（或者交换女人），男权社会得以维系和继续。按照盖尔·卢宾的理论，男人通过交换女人而得以维系由男权控制的亲属关系制度，因此女人只是这个男权社会的交易物品而已，女人在其中的标志的是价格而不是价值。

盖尔·卢宾为女性为何在资本主义时代受压迫的程度反而加深的原因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如果结合电影《金》，我们会发现，盖尔·卢宾对男

8) Linda Nicholson ed. *The Second Wave: A Reader in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7, p.30

9) Ibid., p.39

人之间通过交易女人而获得关系的巩固这一理论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对于交易女人这个问题不仅仅只是由男性操作，甚至女性也参与了其中。在电影《金》中，对金福南在小岛人际关系中的交易表现在金福南被强制限制在岛上，也由此成了两个青壮年继续留在岛上的资本，由此成全了那群老年女性她们此生无法离开小岛的命运。但在这一系列自私自利行为面前，金福南是赤裸裸的被剥削者与被压迫者，因此金福南悲惨命运是由男性暴力与女性的阴谋与冷漠造成的。盖尔·卢宾只是揭示了男性交易女人的现实与背后的原因，却没有揭示在小岛上顽固的男权文化形成中，不仅仅是由于男性的暴力，还由于女性参与进了男性暴力当中而且对此冷漠视之。如果结合电影《盲》，我们还会发现，在女人被交易的历史进程中，不仅仅只存在着为了亲属关系的延续这样的男权社会维系的的目的，还存在着大量的赤裸裸的纯粹的交易关系，在这种赤裸裸的纯粹交易关系中，女性是纯粹的物，她被标志上价格，而她本身除了作为物的价值（生育工具的价值）之外无任何价值。由这两部电影所凸显出来的女性特殊的处境，我们会发现西方女性主义经典文本中被忽略的东方现实。进一步说，在这个由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文化中，东方文化中的那些游离出世界文化的文化，需要我们密切加以关注，并利用它重新审视世界文化，最终让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构成部分，让东西方的人类共享全球化的有益成果。

### 3. “被拐卖的女人”与自由

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sup>10)</sup>的中国传统社会里，女性的角色被定义为一个狭窄的生育工具。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遗落下许多未被现代化洗礼或者拒绝被现代化洗礼的乡村文化。乡村文化与现代都市文化的并立对峙一直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条并行的力量。有时候乡村的力量在一定的时空当中更要甚于

10) 孟子著，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年版，第182页。

都市的现代力量。电影《盲》中，白雪梅被禁锢在中国关中一个偏僻农村的一户只有三口人的农家中。这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文化之外的乡村文化之地。在那个偏僻的时空中，还是大学生的白雪梅不仅要面对被拐卖的处境，还要面对时时侵害自己的乡村文化。与电影中其他被拐卖的女性不同的是，白雪梅一直都没有放弃对自由的渴望，即便是在做了母亲之后。正是在母亲这个身份上，电影中“白雪梅”这个身份让波伏瓦对女性的现象学描写少了一个角色。波伏瓦在《第二性》中用现象学的方法描述了各种不同角色的女性：少女、恋爱中的女性、结了婚的女性、母亲甚至修女等，但是“被拐卖的女人”却不在波伏瓦的描述之内。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被拐卖的女人”这种现象是相对于西方文化来说东方文化特有的现象。更在很大程度上清楚地表明“拐卖女人”是对人性的极大戕害，也是自古以来古老罪恶的现代版本。令人深思的是，全球化时代这种古老的罪恶竟然还能保持下来，要知道殖民时期贩卖黑奴的历史已经过去百年，但是贩卖人口的历史却并非只是集中在殖民时期，尤其对女性的拐卖贩卖在全球化时代并未随着现代观念的推进而减退。

中国传统社会对家庭观念与子嗣观念的重视，再加上男尊女卑的深重观念，让人们在接受现代文化洗礼的同时也对传统文化中对女性交易的事实视而不见或者沉默对之，如果人们不能从根本上思考为什么交易女性的现实在全球化进行中普遍性共识知识共享越来越快的21世纪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空间的话，那么人们就不能更好更健康地推进世界文化的发展。如果我们从联合国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进程作为人们对该问题真正关注的标志的话，我们会发现只到21世纪联合国才开始真正地从法律和学理上对拐卖人口这个定义进行严格的界定。2000年联合国通过了防止、防制与惩罚人口贩卖，尤其是对妇女和儿童贩卖的议定书 (Protocol to Prevent, Suppress and Punish Trafficking in Persons, Especially Women and Children)，本议定书前言开宗明义反对人口贩卖，尤其对妇女和儿童的贩卖，并于第3条第1项对人口贩卖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所谓人口贩卖，是指基于剥削的目的，招募、运送、转交、藏匿或收受人士，其方式为恐吓或使用暴力或其他形式的强制、绑架、欺诈、蒙骗、滥用权力或利用

其弱点给予或收受给付或利益以获致他人同意控制该人士<sup>11)</sup>。定义中所谓剥削，是指包括最低限度逼迫他人作为娼的剥削，或其他形式的性剥削、强制劳动或服务、奴役或类似奴役的行为，劳役或器官移植等。<sup>12)</sup> 根据这一关于人口贩卖与剥削的定义，电影《金》与《盲》中都构成了对女性的性剥削与贩卖的罪行。在现实中，关于这一罪行的控制近几年较往年更加严厉。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即便如此，在现实中，这一对女性的贩卖与剥削仍然存在，甚至并没有随着联合国关于人口贩卖与人口剥削的定义的出现而消失，也没有因为东亚各国因为法律的严厉而变得松动。因此，这样的现实不得不逼迫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儒家文化圈中的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在全球化世界文化普遍性共识知识面前的复杂性。出现在韩国与中国的这一题材的电影，比如《金》和《盲》，并非偶然，它伴随着坚实的文化根基以及由此历久的文化根基所形成的人性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在世界文化普遍性共识知识面前，尤其在对待女性这一问题上，愈发暴露与凸显。尤其在中国，贩卖女性与儿童近些年却有愈演愈烈之势，但是文学艺术表述上却鲜有。导演李杨的《盲》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但与其说这是艺术的表述，不如说这是现实要让人们接受不得不采取艺术外衣的无奈与尴尬。

从儒家文化传统来说，要实现“孝”这一目的，对于偏僻农村来说必须要有一个女人为中介。因此对于那些被拐卖的女性，她们的不幸首先在于她们要被迫去做一个母亲。电影《盲》中，母亲的形象有三个：一个是白雪梅；一个是白雪梅的婆婆；另外一个同样是同样被拐卖的女人。但是对于母亲这一角色，三个

11) Article 3(a) “Trafficking in person” shall mean the recruitment, transportation, transfer, harbouring or receipt of persons, by means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or other forms of coercion, of abduction, of fraud, of deception, of the abuse of power or of a person of vulnerability or of the giving or receiving of payments or benefits to achieve the consent of a person having control over another person, for the purpose of exploitation.

12) “Exploitation shall include, at a minimum,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prostitution of others or other forms of sexual exploitation, forced labour or services, slavery or practices similar to slavery, servitude or the removal of organs.”

人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对于白雪梅来说，做母亲是被逼迫的，因此对于孩子，她并没有多少情感，因为对买她的一家人的仇恨更胜于对孩子的情感；对于白雪梅的婆婆来说，做母亲是女人的命运，而且做了母亲的女人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也会服服帖帖地伺候男人和男人的父母；而对于那个同样也是被拐卖的女人来说，做母亲是被拐卖之后必然的命运，接受与否不是由她个人决定的，但是少挨打、养好身体才能最终逃出乡村。由此可见，母亲这个角色以及对这个角色的认同，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一成不变的模式和样本，现实的呈现与儒家文化对母亲角色的定义大相径庭。悖论的是，中国乡村对女性的母亲角色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中国几千年儒家传统文化的窠臼里走不出来。

波伏瓦曾经对母亲角色用现象学的方法进行过细致的描述，她从堕胎问题谈起，到女性成为母亲的过程，再到培育子女的过程。波伏瓦在描写母亲这一个角色时提出的观点对后人最有启发的莫过于：母亲这个角色不是自然的，母亲对孩子的爱不是自然的，即做母亲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被规训与自我规训的过程，波伏瓦说：“认为女人只有通过做母亲才能与男人平等，这是一个建构的神话。”<sup>13)</sup>之所以是一个建构的神话，是因为留在家中做母亲恰恰不能实现女性的自由，没有自由的女性何谈与男性的平等。正如波伏瓦说：“拘囿在家中的女性不能自己实现自己的存在，不能实现她的个体性，而个体性不是被别人承认就可以的，而是应当自己去实现。”<sup>14)</sup>而在《盲》中，白雪梅通过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母亲这个角色的建构性以及波伏瓦对母亲这个神话的批判性观点：从她得知自己被拐卖那一刻起，她就从未停止过反抗和逃跑；即便她被迫做了母亲，她仍然在想法设法逃走，甚至以孩子为掩护企图带着孩子一起逃走。白雪梅之所以要带着孩子一起逃走，从影片中人物的刻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不是由于白雪梅对孩子那与生俱来的爱（传统文化认为母亲对孩子的爱是生俱来的观念同样是神话性的建构），而是由于白雪梅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将孩子带出那个穷山僻壤，那么孩子未来的命运很可能是凄惨的，正是出于这样的

13)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p.569

14) Ibid., p.570

考虑，所以做了母亲的白雪梅每次计划出逃都是带着孩子一起逃。在影片的最后，当白雪梅的父亲带着警察找到了她，她仍然要带着孩子一起走。从白雪梅身上，我们看到关于母亲角色的另一重更沉重的诠释：母亲角色绝不是固囿女性自由的理由、手段和目的，更不是女性唯一的角色；换言之，如果企图通过强迫手段让女性成为母亲从而实现卑鄙的目的这一行为，在现代文明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现实处境来看，被拐卖的女性当中，很多人都逃不过做母亲这一角色。反过来说，如果因为她自身的原因做不成母亲，那么她的下场或许会更悲惨。然后，正是因为女性的这一生育的工具性特征让拐卖女人变得更加复杂。母亲与自由这一问题看似没有联系实则内在关联紧密。在现代文明中，母亲的自由变得更重要，但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中的母亲不需要付出育儿的辛苦与时间，而是说现代社会中母亲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对于她本人以及孩童甚至整个社会都有重要的意义。而这种现代性的观念与儒家传统文化中对母亲角色的认识是有根本上的差异的，前者是对一个人的自由的认同，而后者是对一个角色的作用的认同。在现代文明中，母亲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角色；而在儒家传统文化中，母亲只是一个母亲，她的个体性是不存在的。

如果结合波伏瓦对西方文明中对母亲角色的神话性建构的批判与电影《盲》中白雪梅的母亲角色另一种实践，然后再回到儒家传统文化中对母亲角色的认识，我们会发现，关于对拐卖女人的文学艺术上的反思，我们不但要反思全球化带来的那种充满了普遍性共识的世界文化，同时作为东方的学者，我们还不得不反思传统文化加诸于、铭刻于我们观念深处的那些反人性的、暴力的成分。反过来说，西方文化也必须反思它们的历史文化加诸于的反人性的、暴力的成分，同时反思世界文化中的那些普遍性共识的知识。透过电影《盲》以及其中的人物的母亲角色，再反照我们正身处于其中的多层面、网络状的文化结构，当我们反思全球化、世界文化以及个体文化时，我们必须思索其中所透露出来的复杂、丰富而隐秘的文化悖论与理论的黑洞。

#### 4. 结论：自由之途

自由，这一西方文明带给世界的最宏大又最细微的知识，几乎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扩展成为了整个世界的普遍性共识知识的关键性组成部分。但是对自由的理解和阐释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正如哈耶克对自由主义的认识——“自由主义一词现在是以各种不同的含义使用着，而这些含义，除了描述出它对新观念的开放性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sup>15)</sup> 自由一词在不同的定义下被有区别地使用着。自由的概念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史中被使用最深刻得要数波伏瓦，一方面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为自由的立场；另一方面波伏瓦还提出自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具体的自由，一个是抽象的自由。对于具体的自由来说，女性必须出去参与工作中，必须获得经济的独立，这是具体自由的保障，正如波伏瓦说：“正是通过工作，女性才能最大程度上减少与男性的差距，只有工作才能保障她们的具体自由”<sup>16)</sup>。女性必须行动，而且必须是真诚地投入行动中。关于这些必须真诚投入的行动，波伏瓦没有一一指出是什么，但是我们能够猜测到那种行动必须是朝向自由的。因为波伏瓦在她的另一本书《模糊性的道德》中说：“人所预定的最高目标就是他的自由，自由是唯一可以构成任何目标价值的东西。”<sup>17)</sup>

反观电影《金》与《盲》，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金福南与白雪梅她们都没有任何自由，虽然她们要不停地参加劳动，但是她们的劳动都没有任何报酬，更不要说任何自由，因为自由的前提必须是经济的独立。其实，如果我们真诚地看待像金福南与白雪梅这样的女性的命运，我们会发现，自由并不像波伏瓦所说的那样有两种区分，实际上自由只有一种：要么自由，要么不自由，没有

15) 王炎等编，《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08页。

16)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p.721

17) [法]波伏瓦著，张新木译，《模糊性的道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06页。

既自由又不自由的模糊状态。尤其当像金福南与白雪梅这样的女性最后被逼迫得不得不使用暴力才获取自由时，自由就变得极其具象：身体的自由。只有身体有毫不阻碍地出入空间内外的自由，才是自由的最基本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当波伏瓦认为女性只有通过工作获得经济独立才是自由的基础时，透过电影《金》与《盲》中金福南与白雪梅的命运，我们不得不将波伏瓦关于自由基础的界定再往后退一步：自由，首先是身体的自由，如果没有了身体的自由而谈自由，自由也只能是空想。



## 参考文献

- 孟子著, 杨伯峻译注, 《孟子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60年版。
- 董仲舒著,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
- 王炎等编, 《自由主义与当代世界》,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年版。
- [美]佩吉·麦克拉肯主编, 艾晓明、柯倩婷副主编, 《女权主义理论读本》,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郑克鲁译, 《第二性》,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版。
- [法]西蒙娜·德·波伏瓦, 张新木译, 《模糊性的道德》,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版。
- [德]黑格尔, 贺麟、王玖兴译, 《精神现象学》(上、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ed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Toril Moi. *Sexual/Textual Politics: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 Susanne Moser. *Freedom and Recognition in the Work of Simone de Beauvoir*. Frankfur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 Theo D'haen, David Damrosch and Djelal Kadir eds.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World Liter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Zhang Longxi. *From Comparison to World Literature*.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15.

Abstract

**“Women in Traffic”/“Women Trafficked”and Freedom**

—An illumination of *Bedevilled* and *Blind Mountain*

Cheng, Hongw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culture and common sense of the common knowledge during the time of deeper globalization, both the South Korean film *Bedevilled* and the Chinese film *Blind Mountain* present a trend in which there is a phenomenon that the common sense of the globalization has no way to recover and illuminate the rural culture to some extent. However, in contract, the rural culture gradually becomes a power to resist the world culture and common sense of globalization. Rethinking two main texts of feminism (Simone de Beauvoir’s *The Second Sex* and Gayle Rubin’s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as two texts that present the world culture and common sense of the common knowledge), and revising the two films from East Asia (South Korea and China), we can rediscover that women without freedom living in rural culture nearly disappear in the world culture and common sen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Meanwhile the western classic texts of theory usually cannot illuminate the facts in eastern Asian socie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rethink the freedom as a common sense for the women in the whole world, we have to revise the world culture and common sen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eper globalization. Also we have to argue that the body freedom is the foundation of women’s freedom, other than economic freedom from Simone de Beauvoir.

Key words : World Culture; Freedom; Women in traffic; Women trafficked; Body

투 고 일 : 2016. 5. 10. / 심 사 일 : 2016. 5. 15.~ 2016. 6. 15. / 게재확정일 : 2016. 6. 16.